

张芝联著

从『通鑑』到人权研究

生活·讀書

新知三联书店

从《通鉴》到人权研究

我的学术道路

张芝联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通鉴》到人权研究：我的学术道路/张芝联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10
ISBN 7-108-00848-3

I. 从… II. 张… III. ①史学家, 张芝联-学术思想 ②张
芝联-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3630 号

责任编辑	苑兴华
封面设计	张 红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625
字 数	301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定 价	19.80 元

目 录

我的学术道路——从《资治通鉴》到人权研究（代序）	1
--------------------------	---

中国史·中国史学·中外关系

《资治通鉴》纂修始末	25
关于曹操和黄巾起义的关系的一个理论问题	39
评王充《论衡》	43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中国史学的特点	61
近百年来中国的法国革命史学（1889~1989）	68
法国大革命在中国激起的浪潮	78
相互了解无止境——中法文化交流史片段	85
中国工人在南非英属德兰斯瓦尔（1904~1910）	98
牢固地建立史学理论这门学科	130
当代中国史学的成就与困惑	132

西方史学·法国史

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	153
历史学与社会学	169
第二次大战以来的西欧史学	183
西方史学发展的新趋向	195
西方研究史学史的方法对我们的启示	201
悼两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213
评希尔《教会的经济问题》	217
评瑟诺博斯《法国史》	220
皮·米盖尔著《法国史》汉译本序言	226
索布尔《法国大革命》汉译本序言	229
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汉译本序言	244
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252
托克维尔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261
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序言	276
《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序言	281
法国革命史学三十五家	285

教学改革·人权研究

为什么要学习世界近代史? ——

《外国历史常识·近代部分》序言	311
把文科各门学科真正建立起来——以法国史为例	324
关于编写世界通史新教材的几点意见	331
致北京大学领导同志书——谈教学改革	337
教师在高等学校的地位和作用	347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	
赠青年史学工作者	350
坚守阵地, 必有所获——	
纪念《历史研究》创刊四十周年	353
人权研究应成为当前重点课题之一——	
在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356
关于国际人权研究的几点意见	360
人权研究在中国——在马尼拉国际人权研讨会上的发言	366

附 录

中法文化交流——历史的回顾	373
---------------	-----

我的学术道路——

从《资治通鉴》到人权研究

(代 序)

我出生于1918年11月7日，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1月11日）仅四天，恰好又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一周年纪念日，仿佛预示我是为和平进步事业而生的。

我原籍浙江鄞县（宁波），生于湖北汉口，当时父亲（张寿镛，字咏霓，号约园）刚从湖北财政厅退下来，不久奉调到北京财政部任职，举家北迁，定居西安门。1922年，父亲调任浙江财政厅长，1924年因江浙军阀混战而辞职。第二年1925年5月调任沪海道尹，全家又迁居上海。接着就发生“五卅”惨案。父亲一边与各方冲折，力争释放被捕工人学生，一边应被美国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开除的爱国师生五百余人之请，与上海社会贤达商议，共同创办私立光华大学，并被推为第一任校长直到1945年去世。^①

我自幼在家塾读书，从未进过幼儿园、小学、初中，在家延请老师讲授四书、左传、诗经、尚书、古文、唐诗、宋词，虽然囫圇吞枣，死记硬背，但长大后也能领会一二，至今仍能记诵。另请教师补习英语、数学，准备中学入学考试。13岁那年我直接进入光华大学附中高中一年级。当时正值1931年“九·

^① 参阅《约园著作》，张芝联编，1995年中华书局。

一八”事变，语文老师出时事题，我因史地常识贫乏，作文几乎不及格。幸而得到同级同学姚克广（依林）、谢云晖、沈叔勤、朱启銮等帮助，学习逐渐有所长进。

我的第一篇文章《世界经济会议》（1933）和第二篇《从墨索里尼到希特勒》（1934）都刊登在《光华附半月刊》上。文章写得不很像样，学校为鼓励学生写作积极性予以发表。回想起来，原来我对世界历史和国际问题的兴趣植基于此。

1934年夏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上海沪江大学医预科，准备将来当医生。这是由于一次偶然事件的激动而随意作出的选择：1934年2月，我二哥的岳父、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赴浙江长兴考察石油，在武康县因车祸头部受伤，昏迷不醒达数周。我决心中学毕业后去学医，而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数理化基础较差，不能胜任；加上病症，一年后不得不放弃医预科而转学文科。1935年夏我考入北平燕京大学西语系，从头学起。

两年的燕大学习生活，对我在政治上学术上产生了启蒙作用。1935年“一二·九”、“一二·一六”的抗日运动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运动前后我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初步接触到了艾思奇《大众哲学》一类的马列主义书籍。从二年级开始，在学习英国文学和西洋历史的同时，我逐渐被中国学术思想史所吸引；从先秦诸子到康梁及近人胡适、顾颉刚、钱穆等人的著作中吸取文化养料。燕京大学的学术空气和自由环境有利于相互切磋，探索真理，使我得益匪浅。

1937年的“七·七”事变截断了这种“象牙之塔”的学习生活。因南北铁道中断，我无法自沪回燕大，只能作为“流亡学生”，冒日机轰炸的危险，由上海经南京到武昌武汉大学借读。一个学期尚未结束，武大被迫内迁。我没有勇气随往，听说上

海各大学已复课，乃经广州、香港返沪，转入母校光华大学，继续学习西洋文学与中国历史。

在光华两年，我有幸遇到了几位好老师：一位是英国文学教授张歆海先生，一位是中国历史教授吕思勉（诚之）先生，一位是中国古代史专家童书业（丕绳）先生。在当时自由选课制度下，我选读了这三位老师们开的几乎全部课程。

我在英语和英国文学方面的修养主要得力于歆海先生的教导；除此之外，他对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兴趣和研究也给予我深刻的影响。^① 我从吕先生那里学到的不只是一段中国历史的具体知识，而是他的治学方法和观点。他上课不带讲稿，往往先在黑板上写几段史料，然后加以解释、分析、归纳，最后得出结论。他的视野广阔，重视各方面的历史现象——社会、经济、文化、制度、思想……，可称全方位史。我最记得他的《史通》专题课，一学期讲完了中国第一部史学史，有述有评，十分精彩（见《史通评》）。后来他又开过《文史通义》专题课，可惜我已离校，但仍有幸读到他的讲义。我对中国史学的粗浅知识主要得自诚师。

童书业先生开设的中国沿革地理课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这是由于在燕大时读了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自序而产生的。我十分佩服童师的博闻强记能力，他能一口气背出几十条材料，一一写在黑板上，然后加以论证和发挥。我把每堂课的笔记都整理出来送给童师审阅，他略加修改补充后交付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中国沿革地理》。^②

我于1940年初毕业，学士论文的题目是《中国古代史学

① 参阅郭蕊：《天涯赤子情》，《人物》1986年第3期。

② 开明书店1946年版。

——从《尚书》到《史记》，是用英文写的，因为我主修西洋文学，副修历史。在写作过程中，我初步接触到了西方特别是法国汉学家的著作，如沙畹（Chavannes）译的《史记》，马伯乐（Maspero）的《古代中国》，葛兰言（Granet）的《中国文化》，《舞蹈与传说》以及费子智（Fitzgerald）的《中国文化简史》等，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有一定的帮助。

在大学四年级时（1939），我和光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创办了《文哲》杂志，目的是活跃学校的学术空气，交流学习心得。我曾在这份杂志上发表几篇论文：《什么是古典主义？》，《历史理论引论》，《古代的中西交通》，《柏拉图的共和国》等，虽然很不成熟，也反映了我当时兴趣所在。

大学毕业后，我在母校附中教英语，历时一年半。这里要交代一个插曲：在我毕业前夕，父亲要我谈谈将来志向。我说：“我很想当一个中学校长，大学教授。”我当时颇受英国公立学校（实际是私立中学）的影响，认为只有中学水平高才能保证大学生的质量。我父亲提醒我，“那你的月薪恐怕只有二百元。”我答道，“没有关系，这是我的心愿。”父亲莞尔而笑，表示认可。后来我果然当了附中校长兼大学教授。确实，直到80年代中，我的月薪仍为207元，但已算是高薪阶层了。

1940年夏，我应林语堂之兄林憾庐之邀，编辑一本翻译杂志——《西洋文学》，内容是西方文学名著和文论书评，我约请当时还留在孤岛的巴金、郑振铎、李健吾、赵宗璧、叶公超为编辑顾问。我尽力向远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名译者潘家洵、孙毓棠、卞之琳、姚可昆（冯至夫人）等和北平的新秀宋梯芬（淇）、吴兴华、南星、黄宗江等征稿，因而大大提高了译文的水平，丰富了刊物的内容。我在1940年7月和燕大同学郭心晖

(蕊)结婚，她当时在上海工部局女中教国文。我们新婚燕尔，立即投入《西洋文学》的编辑、审稿、翻译、校对、征稿的繁重工作。到1941年夏止《西洋文学》共出了十期，终于因物价昂贵、资金告罄而停刊，我们也于8月离开上海。

1941年秋我重新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一方面我觉得自己需要充实，仍想当学生；另一方面，当时作为美国教会学校的燕大在沦陷的北平尚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这是我所热心向往的。我的朋友宋悌芬、吴兴华等在燕大主编《燕京文学》杂志，我在上面发表了两篇短文：《传记文学》和《历史与文学》。我不认为史学是一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科学，它既有科学成分，也有文学与哲学成分。

回到燕大，当时哈佛燕京学社主持人洪业（煨莲）教授找我谈话（我当时享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每年五百元）。他向我摆出历史系研究院导师的阵容——容庚（希白）、邓之诚（文如）、张尔田（孟劬）、王克思（Philippe de Vargas，瑞士人）；他逐个介绍并评论他的四位高足：齐思和、聂崇岐、翁独健、侯仁之的专长和特点。最后他根据我的家庭背景和学术兴趣及特长，建议我以明末清初历史作为专攻范围，理由是：第一，浙东文人学士在这个时期在政治、学术上作出过辉煌的贡献，而我恰好是鄞县人，我父亲编刊的《四明丛书》收集了这方面的大量史料，我应继承这份宝贵的学术遗产。我还记得他大声朗诵全谢山的诗句：

“野人家住鄞江上，但见山清而水寒，
一行作吏少佳趣，十年读书多古欢。”

他向我提出的第二个理由是，明末清初是中国和西方文明初次接触的时期，这段历史西方学者虽作过不少研究，但他们没有掌握中国资料；中国学者也有志于此，但缺乏西方语文的训练，无法利用外国材料。因此，洪师认为我具备这方面研究的初步条件。第三，明清史专家邓文如教授和瑞士教授王克思有能力来指导我的研究。我答应考虑这个合情合理的诱人建议。

在此期间我拜访了研究院导师张尔田先生，人们尊称他为“孟老”。一位羸弱矮小的老人，蓄着短须，十分近视，说话带有浙江口音，经常咳嗽，但仍不断吸烟。谈得高兴时手舞足蹈，目光炯炯有神。我作了自我介绍，他说认识我父亲，大约在光绪三十年间两人先后在苏州候补知府。二十年代后期，他与胞弟张东荪先生一度在光华大学执教。孟老是清末遗老，与王国维（静安）、孙德谦（益庵）共称“三友”，或称“三才子”。我逐渐发现，孟老在义理、词章、考据、佛学等方面都有传世之作，他集浙东浙西学术于一身，而尤尊章学诚（实斋）《文史通义》。我暗自庆幸能拜孟老为师，他对我也格外诱掖，爱护备至。孟老七十华诞，父亲赠他七律两首，末两句曰：“洛社寻常何足道，最难争献见黄篇”，把孟老比作今之梨洲。从这时起直到1944年底我离京返沪这三年多时间里，我不间断地去向孟老请教，并把他的答问写成摘记。可惜这两本问答录在“文革”中遗失了。

我的学运不佳，开学不到三个月，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燕京大学，大肆搜捕进步师生。孟老因受惊发病，不得不从西郊迁居西城，东荪先生夫人要求我与孟老同住，照顾老人，直至翌年端午节前东荪先生出狱，我才移居东城宽街，但每周仍往探视聆教。

1942年5月我应聘任中法汉学研究所助理。中法汉学研究所是用中法庚子赔款创办起来的，名义上由中法合办，实权则操在法国人手中。研究所所长是法国汉学家铎尔孟(d' Hormon)，曾任袁世凯顾问，后在中法大学教书。由中国和法国学者联合组成研究组，研究重点为中国民俗学、中国语言学；后来又吸收前燕大引得编纂处的部分人员继续编印中国古籍的索引，改名为“通检”。我的主要工作是编译汉学论文提要 and 展览会目录，工作并不繁重，有充分时间读书钻研。我认真点读了中国史学经典，旁及《困学记闻》（孟老有批校）、《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史微》等。

在孟老和聂崇岐先生指导下，我写了《〈资治通鉴〉纂修始末》一文（刊载在《汉学》创刊号1944年）。这是我第一篇略有创见的论文，材料翔实，言之成理，结论基本正确，直到60年代翦老重写此题时仍需参考此文。看来我的学术方向似乎要朝中国史学史发展，因为我准备在考订《通鉴》各段分修人之后，进一步探讨司马温公的史学方法与历史思想。

与此同时，我尽量利用中法大学图书馆浏览西方史学名著，在与法国汉学家接触中，努力了解他们所用的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的方法。我结识了一位颇有学术修养和艺术志趣的余敦华(Geoffroy Dechaume)，我们朝夕相处，如琢如磨，探索中西文化的异同，赞赏古都的文物建筑。他在一本著作中记载了我们的友谊，这本名为《中国面向世界》(1967)的书在他逝世后十年译成汉文出版(三联书店1987)，书中首次发表了我们的16封信件。为了盖上一层保护色，他称我为“唐林”。

1942年端午节前后，燕大师友陆续出狱，我的住处虽然离日本宪兵队所在地只有咫尺之遥，几个好友仍经常来访，畅谈

国家前途与战后建设计划，这是当时最大的乐趣。我念念不忘创办一所第一流的私立中学，许多师友都支持我。还记得1944年初冬，我同侯仁之冒着严寒前往香山慈幼院，考察设想中的中学基地，往返百余里，沿途抒发各自的抱负，海阔天空，不知夜幕之降临。

正在此时，我接到父亲在上海病危的消息。家中男儿都在西南，父亲曾写诗述怀，头两句曰：“生子为人用，生子亦何为？”诗没有写完，一个姐姐偷偷地寄给我。我见诗决定立即还沪，但又不忍与孟老告别，依依不舍者久之。1944年底我与妻子返上海，1945年旧历正月初七日孟老病逝，我闻噩耗恸哭数日，不能自己。唯一能做的是筹资刊印孟老的遗著《遯堪文集》，以表弟子悼念之仪。这部书终于在1948年印出。

从1945年1月至父亲病故，我专心抄录父亲自编的善本书目，整理他的诗文。7月8日是父亲七十大寿，《约园杂著三编》如期印出，使父亲十分兴奋欣慰。光华师生校友前来祝寿，父亲在病榻上以“复兴中华，复兴光华”两句话来勉励他们。此后一周进入昏迷状态，清醒时要我坐在床边为他朗读《归去来辞》。7月15日，他终于未及见到日寇投降而歿。父亲一生做了四件事：做官、办学、著述、编刊《四明丛书》。第一件事是他不愿提及的；他引以自豪的是创办光华大学与编刻《四明丛书》。他的遗言更坚定了我的办学志向。

从1945年8月日军投降到1946年8月这一年中，我全力为恢复光华大学和附中而奔走，特别是在争取校舍和解决经费两件大事上。光华校舍在1937年秋全部焚于日军炮火，十余年心血毁于一旦。父亲悲痛之余并不气馁，1938年端午节前毅然经香港，飞重庆，在成都与四川同仁共同创办光华大学分校。光

华上海本部先迁入租界继续上课，日寇占领租界后，为避免为敌伪利用，光华改名，化整为零，以使弦歌不绝。光复后，光华恢复原名，但校舍无着，经费不足。我在校董会指示下，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向当局争到两座日本中学作为校舍，筹款亦略有眉目。到1946年暑期，新聘大中学校校长先后到任，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找机会出国进修。

我自定出国的目的，一是继续学习历史，一是考察西方中等教育。1946年9月我在美国东岸耶鲁大学研究院注册入学，本拟一年内读完硕士学位，因一去就通过了英、法语考试，并选读三门课程：西方历史哲学（霍尔朋 Holborn 教授），英国史学史（达纳姆 Dunham 教授、寇底斯 Curtis 教授），当代文化（特纳 Turner 教授），三门都是讨论班，前两门需要阅读大量原著，定期交读书报告，学习十分紧张。一学期下来，我的成绩不错，但是我并不安心，一面惦念在上海的老母妻子，一面对美国生活方式及中等教育水平并不满意。同时欧洲朋友经常来信劝我去英、法，那是西方文明的基地，远比仅有三百年历史的美国丰富多采；何况我的经济情况只允许我在国外呆一年。第二学期开学前，我去向几位导师告别，霍尔朋教授（原籍德国）表示理解，虽然流露出一忍看我离去的感情。

1947年3月我放弃耶鲁大学的学位资格，横渡大西洋到英国牛津大学进修。尽管英国正处于战后艰难岁月，必需品都凭票供应，连煤火也不能保证。但我看到的是一个有秩序、有纪律、有理想的社会，工党政府正采取多种措施以解决就业、生活、住房、医疗等问题。我在牛津大学旁听了一个学期，上过科尔（G. D. H. Cole）和坡威克（Powick）教授的课，在开架图书室（Camera）里泛读大量新书，在伦敦走访历史学家汤

尼 (R. H. Tawney) 和汉学家威雷 (Waley), 旁听下议院的辩论。我看到莎士比亚和沃滋渥斯的故乡保存得十分完整; 还参观了各类中学——从贵族的“公立”学校到平民的普通中学, 阶级界线分明。每次去伦敦必到《大公报》驻英办事处, 阅读最新报刊, 打听国内消息。国共谈判失败后内战蔓延, 加强了我早日回国的意念。

1947 年夏, 巴黎教科文组织举办国际了解讨论会, 中国驻教科文组织代表郭有守邀请我前往参加。讨论会历时七周, 我在会上结识了不少外国教育界朋友, 为以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创造了条件。在巴黎与老友余数华重逢, 在他陪同指点下, 我逐渐熟悉了法国的政局变化。战后法国物资奇缺, 人心动荡, 各种政治力量与思潮登台表现, 尤以法国共产党与戴高乐的法兰西人民联盟最为活跃, 力量日益壮大。我当时对政治兴趣不大, 而对法国文化生活的丰富和学术争鸣的自由风气则大为赞赏。

一年多欧美之行结束了, 1947 年 11 月我带回到国内的除了几大箱西方文史书籍外, 是人文主义、和平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反法西斯集权主义的思想。这与国内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 并且不久就爆发了尖锐的矛盾。

回国后经过一段休整, 我自然地回到母校光华大学, 担任大学副教授、中学副校长, 准备从“而立”之年起大干一番。我在大学部讲授西洋通史大课 (二三百人) 和西方史学名著; 在附中则从听课入手, 检查各课教学质量。光华附中是上海若干最好学校之一, 教师水平高, 讲课一丝不苟, 对学生要求严格, 堪称模范教师, 不少教师都在大学兼课。大学副校长兼附中校长廖世承是教育界老前辈, 二十年代后期从南京东南大学来到光华任职, 数十年如一日, 办学井井有条。1948 年底廖先生任

大学校长，附中校务由我主持，直至 1951 年 3 月我离沪北上为止。

我在大学部除讲课外还兼任校长朱经农的英文秘书，一度还代理外语系主任。1948—1949 年是多事之秋，国内斗争异常激烈，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节节败退，但仍图负隅顽抗，迫害民主进步运动。我刚从国外回来，凭一股爱国热情，在讲课时痛斥国民党反民主暴行。我的教学方法也引起一些心怀叵测的人的不满，因为我把二三百学生分为十组，轮流组织讨论，由学生宣读读书报告。这种方法被指控为共产党惯用的宣传方式。1948 年 3 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给朱经农校长的密件，恰好落到我的手中。原文如下：

上海光华大学朱经农校长密鉴 据有关机关报称“该校秘书张芝联秘密领导左倾学生组织成立有秘密组织并借授课时间分析时局攻击本党且煽动学生闹事等情查明具报为要教育部 印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十日 训字第 10394 号

我看了大吃一惊，立即向朱校长报告。朱校长阅后安慰我说：“不要紧，我去南京向中央说明，不必担心。”接着全国发动“反对美帝扶植日本”运动，学生张贴布告响应，遭到反动学生殴打。我在校务委员会上为进步学生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视为“亲共分子”，次日全校贴满恶毒攻击我的大字报和油漆大标语。由于学校当局未及时处分这批捣乱分子，到了 1948 年暑假前他们又发起“改国立”运动，以罢课罢考相威胁，并以我为靶子，要把我驱逐出校，借口是我反对光华改国立，因为我父亲是学校创办人，光华是张家的“私产”等等。这次朱、廖校长亦感到棘手，不得不把肇事为首分子开除、劝退或转学。但这并不能阻止国民党当局在 1948 年底发动大逮捕和